

QWERTYUIOP
ASDFGHJKL
ZXCVBNM
1234567890
~!@#\$%^&*
_+{}|'";:[]<=>`

Linguistics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与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熊 兵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提供的出版基金全额资助

Linguistics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与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熊 兵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熊兵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5622-3728-0

I. 美… II. 熊… III. ①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美国
②汉语—语法—现代—研究 IV. HO-06 H1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4106 号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作者:熊 兵 ①

责任编辑:龚琼芳

责任校对:方汉交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督印:章光琼

字数:145 千字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5.75

版次: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15.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序

本书脱胎于一篇探讨语言学史的博士论文，题目比较专，讲的是20世纪兴盛一时的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怎样影响了汉语语法研究。这种影响毫无疑问是存在的，泛泛地说人们也都认可它，但源头到底在哪里，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涉及的程度有多深，则未必都清楚。本书的贡献，在于把这种影响理出了一些头绪。

说到“影响”，正如著者注意到的，这是一个极含混的概念，需要细加辨析。读某人的作品，上某人的课，听某人的讲演，与某人交谈论辩、书信往来，或者辗转经由他人的述介而获知一二，都有可能受到影响。凡此都是受人影响的途径，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或许有人会不以为然，觉得途径无关紧要，要紧的是结果，究竟是否接受了影响。但问题是，有时我们恰恰需要从分析各种途径入手，才能断定一种影响存在与否。例如，生活于同一时代的学者甲和乙，在某个问题上不仅看法接近，表述很相像，甚至所用的概念术语也一致。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怎样去确认“影响”呢？是甲影响了乙，还是相反？抑或甲、乙都接受了第三方的影响？如果他们在行文中有所声明，称自己受惠于对方或他人，事情就好办了；而如果他们无所交代，史家则会感到棘手，不便轻下结论。这时，就需要去考辨他们可能受人或予人影响的途径。分析各种“影响”的成因和去从，寻索各类事件之间的关联，阐释一种思想或学说的缘起以及赖以产生的条件和背景，这些就是一项语言学史的专题研究需要做的工作，也是任何一项学术史的研究应该达到的目标。学术史家须花力气去发掘陈年往事，然而学术史绝不等于说书讲古，学术史是一门探求历史进程的因由原委的学问，这里用得着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研究原因

的学术较之不问原因的学术更为有益”(《形而上学》卷一,第二章)。

有“影响”便有“接受”。有积极的接受,有意识地模仿、借鉴、汲取;有消极的接受,身被影响而不自知,或虽有所知而不欲道破。接受得多了,逐渐化人为己,最终自起炉灶,于是就有他人之学与自家之学的分别。中国近现代语言学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接受西学影响、谋求自建体系的历史,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者无法回避“影响—接受”的问题。罗常培写《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1930),谈的就是这一问题;王力著我国第一部语言学通史——《中国语言学史》(1981),将最后一章定题为“西学东渐的时期”,讨论的也是同一类问题。两位先生不愧是大方之家,勇于承认中国传统语言研究的弱点,肯定西方语言学给中国语言学带来的好处,特别是理论和方法。王力的史论尤为周备:有总体之论,认为“五四”甚或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基本没有语言学,只有语文学;有分科之论,提出古时只有零星的语法意识,或类近注解的虚词诠释,系统的语法学至清末才着手营建;有局部之论,既对人也对自己,如称“王[力]、吕[叔湘]主要是依靠了叶斯柏森,高氏[名凯]是依靠了方德里叶斯,这样就不免傍人藩篱,始终不能彻底地创立中国的风格”;而对自己则更严厉,说:“‘三品说’本身有着严重的缺点,王力又把它和柏龙菲尔德的‘中心说’混在一起,以致互相矛盾,影响了它的优点。”(见其著第183-185页)这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王力之后已不多见。

语言学史是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应该有一支专门的研究队伍。但语言研究者何妨都来关心一下本学科、本领域的既往史,适当的时候何妨也来研读、探索一点语言学史?不少研究者对史抱有偏识,觉得当代才重要,历史不重要。对此我只想指出一个事实:其实每个现代研究者或多或少都得兼做史的考察,因为不论他细究哪个问题,总要先回顾并综述一番过去的研究,而这样的综述不是历史又是什么呢?

本书付梓时,著者当已赴美深造,相信他对美国语言学史的认识将更进一层,带回新的研究成果。

姚小平

2007年元旦于北外

前 言

20 世纪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特别是与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汉语语法的每一重大事件和重大进展几乎都与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影响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从文法革新讨论(1938—1943),到《语法讲话》(1952—1953)的面世,到词类问题(1953—1955)、主宾语问题(1955—1956)的讨论,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关于描写语言学方法的探讨(1961—1963),再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析句方法的讨论(1981—1982),这一系列事件与进程无不渗透着结构主义,特别是美国结构主义的影响,以至于有学者提出“20 世纪中国语法学的历史就是结构主义逐步兴起并逐步占据主流地位的历史”(马庆株 1999a: 320)。因此,对过去一个世纪的汉语语法研究与美国结构主义的相互关系作一个梳理,理清两者间在语言理论和实践上的异同及继承、发展关系,并考察导致汉语语法研究采纳结构主义框架的原因,是很有必要的。

当然,此前不少学者对此问题已做过一些研究。较早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探讨结构主义语言学对汉语语法研究影响的有台湾的周法高(1973)和张琨(Chang 1975)。不过周法高的文章主要是谈 20 世纪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发展情况,语法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结构主义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则只有一个段落(1973: 311),其中谈到了结构主义对赵元任(Chao 1948)、丁声树等人(1952—1953)的语法研究的影响。尽管只有一个段落,但其中的观点却给人以启发,至今还经常为人所称引。张琨的文章谈到了赵元任、李方桂、王力、周法高等人的语言研究(包括音韵研究和语法研究)所体现出的结构主义

思想,不过他述多评少,其论文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史料的收集整理上。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论述美国结构主义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的论文,是徐通锵、叶蜚声的《“五四”以来汉语语法研究评述》(1979)。该文对这一论题的阐述虽然只占全文的四分之一(两页半),但它清晰地呈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前结构主义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脉络,且论述中史料和史论并重,立论中肯,结论公允。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语法学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出现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论文和著作,其中比较重要、且涉及结构主义与汉语语法研究相互关系的有李临定(1980)、吕必松(1980—1981)、孙叙常(1983)、林玉山(1983)、方经民等(1986)、龚千炎(1987)、陆俭明(1989)等。其中李临定(1980:182)提出结构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结构形式为出发点,二是采用层次分析的方法;方经民等(1986:56-58)对变换分析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应用做了较为详细的讨论;龚千炎(1987)比较注重史料的收集,他把结构主义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引进和发展划为三个阶段,体现出一定的新意。陆俭明(1989)则以语法分析方法为纲,对 20 世纪 80 年代结构主义的方法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最新发展作了综述。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这段时间比较重要、且涉及结构主义与汉语语法研究相互关系的论著有邵敬敏(1990)、朱林清(1991)、陆俭明(1993)、龚千炎(1997)、马庆株、项开喜(1998)、陈保亚(1999)、沙平(2000)、戴昭铭(2001)等。其中朱林清(1991)比较注重史料的运用,但有分量的评论不多。陆俭明(1993)从语法分析方法入手,对层次分析、变换分析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应用及发展进行了探讨,不过在两者之间具体方法的对比研究方面着力较少。陈保亚(1999)特别注重从方法论的角度阐述结构主义与汉语语法研究的相互关系,且在二者的对比研究及史论结合方面做得比较好,只是个别地方结论有欠严谨,似有夸大拔高之嫌,如认为“最早系统讨论分布理论的应该是中国学者”(陈保亚 1999:543),又如认为“陆志韦 30 年代末提出的同形替代法比当时流行于

欧美的方法都强”(陈保亚 1999:77),等等。沙平(2000)也试图从方法论的角度阐述汉语描写语法学的理论与方法,论述虽较为全面,但多为转述前人观点,且未与史实、史料相结合,具有独创性的观点很少。总的来看,在本论题上,语法学界做了一些工作,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就此论题专门做一全面、深入的研究,多数与此有关的论述都是在讨论别的某个专题时作为该专题的组成部分被附带谈到。即便是有专门的论述,也大都流于表面,未能真正深入。比如,在具体的讨论中,很少有人能对汉语语法研究中结构分析方法的萌芽进行思考,即便是有所考察(如董杰锋 1987: 351;陈兴伟 1996: 47),也是零散的,非系统的,且未能与本论题相结合。又如,很少有人能从史料对比研究的角度对结构主义与汉语语法研究在具体分析方法上的异同进行剖析,更少有人能对过去大半个世纪汉语语法研究采纳结构主义框架的原因进行探讨。此外,大多数人在谈结构主义与汉语语法研究的关系时,都会举出一些事例来证明前者对后者的“影响”。然而,“影响”一词看似简单,实质上涉及非常复杂的问题。“泛泛地说甲受乙影响,而不作具体考辨,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姚小平 1996: 12)。最近有学者呼吁“语言学史学对‘影响’的研究应适可而止”(钱军 2003: 548),其实更准确地讲,不如说“对‘影响’的浮泛的研究应适可而止”。否则,这样的研究是不可能深入的,也没有太大的价值。另外还需指出,在涉及本论题的不少问题上,语法学界还有一些误解,例如认为朱德熙的变换分析是基于 N. Chomsky 的《句法结构》(1957)(如胡明扬 1992: 56;龚千炎 1997: 339 n. 1);认为陆志韦的扩展法是基于 R. Wells 的“扩展”的概念(陆俭明 1993: 7;沙平 2000: 122);认为“美国描写语言学运用层次分析,只讲切分,不讲定性”(陆俭明 1993: 16);认为层次分析法不讲意义、不能分析非连续结构(如史存直 1981),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必要予以澄清。由此看来,对结构主义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关系作一全面、深入的对比研究,是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

下面对本文各章的内容作一简介。

第一章“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首先介绍了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然后阐述了该学派主要的分析方法，即替换法、分布分析法、直接成分分析法和变换分析法。第三小节讨论了美国结构主义语法的研究情况。第四小节对涉及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两个重要问题，即行为主义的影响及意义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得出了一些有异于以往传统看法的结论。该章最后一小节论述了该学派在描写与解释问题上的误区。

第二章从三个方面讨论了汉语语法研究中结构分析方法的萌芽。首先，层次分析观念的萌芽已见于《马氏文通》对句法分析的阐述。其次，分布分析的萌芽也已见于《马氏文通》和《国文法草创》等早期汉语语法论著。再次，变换分析的萌芽见于《马氏文通》、《国文法之研究》、《中国文法要略》、《中国现代语法》等多部论著。因此，汉语语法研究最终采纳结构主义的框架，既有外部因素（即美国结构主义的学术环境）的影响，也有自身因素（即结构分析方法的萌芽）的作用。

第三章介绍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引入中国的情况。该章把结构主义在中国的引进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步引进阶段（1930—1948）、进一步引进阶段（1948—1966）和全面引进阶段（1979—1990），并对每一阶段的具体情况作了考察。

第四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从语法研究方法论的角度详细阐述了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关系。该章分为五个小节。第一小节“单位论”从语素分析与词的提取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分布法、同形替代法和扩展法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应用，并比较了这些方法在汉英语法研究中呈现的不同特点。第二小节“词类论”首先回顾汉语词类研究的发展历程，然后分别讨论“功能”与“分布”的意义，特别是区别了几种不同的分布类型，并利用这些分布类型的概念重新解释“鉴定字”和“句子成分定词类”。本小节还提出了词类划分的根本标准是“分布”，而不是“功能”或“语法特征”的观点。第三小节“层次论”首先回顾汉语层次分析的发展历程，然后把国内学者

提出的层次切分原则与描写语言学的切分原则进行比较,指出两者的异同。本小节还把描写语言学的扩展法与国内学者提出的扩展法进行了比较,并着重讨论了并立扩展法。第四小节“变换论”首先回顾汉语变换研究的发展历程,然后把汉语的变换理论与 Harris 的变换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了两者的异同。第五小节“形式—意义论”讨论了描写语言学对汉语语法研究中关于形式与意义关系问题的影响,提出正是由于描写语言学的引进,才触发了汉语语法研究中对语言形式的高度重视,同时也促使语法界对形式与意义的关系问题进行反思,并最终使正确的形式—意义观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得以确立。

第五章讨论了结构主义中国化的问题。第一小节以吕叔湘和朱德熙为例,考察了中国学者在语法研究中对美国结构主义的态度。第二小节讨论了汉语语法研究对结构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扩展法和并立扩展法、层次分析中对直接成分间关系的定性以及变换分析的原则。第三小节考察了汉语语法研究采纳美国结构主义框架的三个主要原因,即学术背景的影响,学术传统的契合及汉语自身的语法特点。文章最后的“结语”部分对全文的观点作了总结。

需要指出的是,汉语语法研究涉及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及海外几个区域。本文主要讨论中国大陆学者的汉语语法研究与结构主义的关系,在海外学者中,赵元任的语法研究“在理论、方法和体系方面都奠定了从 5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国内居于主流地位的结构主义汉语语法的基础”(胡明扬 1996a: iii),因此在文中自然也着墨较多。至于港台地区,受美国结构主义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周法高,这在他的《中国古代语法》(1959—1962)中体现得较为充分(见 Chang 1975: 292; 林玉山 1987: 43-44)。不过,由于他在书中主要是讨论古代汉语语法研究,因此其语言研究中的结构主义问题在本文中未予讨论。

另外还要指出一点。虽然美国结构主义对汉语语法研究影响很大,但很难说我国存在一个类似美国结构主义的学派。一个学派的

形成需要一定的哲学基础和统一的纲领,要有特定的学术领地和标志性的理论与主张。然而这些在目前的汉语语法研究中尚不具备。因此,至少到目前为止,“在我国没有也较难形成跟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法学相对应的学派”(萧国政 1997: 224)。不过我们认为,汉语语法研究中的结构主义语法观是一个客观存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美国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如替换法、分布法、层次分析法、变换分析法等)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2)从形式出发的语言研究理念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同(如范晓 1988;徐思益 1994);3)重实证、重归纳、重描写的语言研究态度在语法研究中占有主导地位。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 20 世纪后半叶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主要采纳了美国结构主义的框架。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涉及语法研究的方方面面,因此全面、深入的考察殊为不易。而涉及这一课题的不少观点人们也曾反复谈起,想提出具有创新价值的观点绝非易事。不过,本书愿在这方面做一点有意义的尝试。在写作过程中,本书试图做到有“史”有“论”,“史”、“论”结合,力争使本研究达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此外,在论述中尽力注意事件的背景因素、特别是学术背景因素的影响,并根据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尽可能多地提供有价值的背景材料,以便为今后该课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基础。

目 录

序	(1)
前言	(1)
第一章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	(1)
1.1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	(1)
1.1.1 美国结构主义的产生	(1)
1.1.2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	(8)
1.2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	(15)
1.2.1 替换法	(16)
1.2.2 分布分析法	(17)
1.2.3 直接成分分析法	(19)
1.2.4 变换分析法	(23)
1.3 结构主义语法	(28)
1.4 结构主义语言学再认识	(34)
1.4.1 行为主义的影响	(34)
1.4.2 意义问题	(37)
1.5 描写与解释	(40)
第二章 汉语语法研究中结构分析方法的萌芽	(43)
2.1 层次分析的观念	(43)
2.2 分布分析的观念	(47)
2.3 变换分析的观念	(51)
第三章 结构主义理论与方法的引进	(55)
3.1 初步引进阶段(1930—1948)	(55)
3.2 进一步引进阶段(1948—1966)	(57)
3.3 全面引进阶段(1979—1990)	(63)

第四章 结构主义语言学与汉语语法研究	(67)
4.1 单位论	(67)
4.1.1 语素分析	(67)
4.1.2 词的提取——扩展法	(77)
4.2 词类论	(82)
4.2.1 汉语词类研究的发展历程	(82)
4.2.2 功能、分布与结构主义	(92)
4.3 层次论	(103)
4.3.1 汉语层次分析的发展历程	(103)
4.3.2 切分原则	(108)
4.3.3 “扩展”辨义	(111)
4.4 变换论	(114)
4.4.1 汉语变换分析的发展历程	(114)
4.4.2 汉语变换理论 vs. Harris 的变换理论	(118)
4.5 形式—意义论	(122)
第五章 结构主义的中国化	(126)
5.1 中国学者对美国结构主义的态度	(126)
5.2 汉语语法研究对结构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131)
5.2.1 扩展法和并立扩展法	(132)
5.2.2 层次分析中对直接成分间关系的定性	(133)
5.2.3 变换分析的原则	(134)
5.3 汉语语法研究采纳美国结构主义框架的原因	(136)
5.3.1 学术背景	(137)
5.3.2 学术传统	(138)
5.3.3 汉语自身的语法特点	(142)
结语	(146)
参考文献	(150)
汉英术语对照表	(169)
后记	(172)

第一章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

在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对“结构(主义)语言学”以及“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这两个概念作一点说明。当然,要准确地定义这两个概念并不容易,因为它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如对“结构语言学”这一术语,G. C. Lepschy 就认为它“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意义”(1982: 35)。Hymes & Fought 的《美国结构主义》(*American Structuralism*, 1981)一书迄今仍被认为是“论述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最为全面的著作”(Falk 2003: 204),但全书并未给“结构语言学”下一个明确的定义。C. F. Hockett 作为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掌门人之一,甚至曾表示,“我一直不很确定‘结构主义’应该是怎么回事,除了知道它用来指 20 世纪强调‘系统’和‘模式’的语言研究理念,以与 19 世纪的‘原子主义’(atomism)的研究理念相区别”(转引自 Falk 2003: 204)。事实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 F. de Saussure、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代表人物 L. Bloomfield 却未使用过“结构主义”之类的术语。本书无意纠缠于这类术语或概念之争,而是遵循传统的做法,把“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解为以 Saussure 语言学思想为源头,以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结构主义为主体的一个语言学派别,而把“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解为以 Bloomfield 和后布龙菲尔德学派的学者(post-Bloomfieldians)为代表的美国描写语言学派。

1.1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

1.1.1 美国结构主义的产生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和文化

环境的影响。“一门科学的发展,除了受到自身历史的影响以外,也受到当时各种社会因素和占主导地位的学术观念的影响”(Robins 2001: 4)。例如,19 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就受到了当时的哲学思潮和生物科学(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地质学和比较解剖学等学科的巨大影响(参看 Koerner 1995; 姚小平 1998, 1999)。同样,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也深深根植于一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之中,其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理论根源。

1.1.1.1 社会背景

19 世纪的美国语言学研究主要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以 W. D. Whitney 为代表的、具有欧洲语言学研究传统的比较语文学及有关语言基本性质及规律的研究,另一条则是具有人类学传统的对印第安语言的田野调查研究(field work)^①。其中对美国描写语言学的诞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是人类学学者对印第安语言的田野调查工作。实际上,这种田野调查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当时的人类学家发现,某些印第安人的土著语言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会讲,而且这些语言都没有文字记录。随着土著人的死去,这些语言也就永久消亡了。这种情形使人类学家产生了一种紧迫感,即必须在这些语言消亡之前尽快把它们记录下来。这样的社会背景便成为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的土壤。其实不仅仅是人类学家,就连一些政治活动家如 B. Franklin 和 T. Jefferson 等也对印第安语的调查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不过,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工作始于 19 世纪初,而 P. S. Duponceau 和 J. Pickering 则由于其出色的研究成为“19 世纪上半叶最为活跃的人类语言学家”(Andresen 1990: 40)。19 世纪下半叶,人类语言学的主要成就体现在 J. W. Powell 发表的《墨西哥以

^① Whitney 的语文学研究与人类学者对印第安语的调查研究形成了鲜明对照。正如 Seuren(1998:180)所言:“与田野调查工作者相反,Whitney 对美洲印第安语没有什么兴趣,而是专注于比较语文学的研究……”另外他对印第安语的鄙视态度也与人类学者的态度形成了强烈反差。

北美洲印第安语系》(*Indian Linguistic Families of America North of Mexico*)。这部著作首次对这一地区的语言进行了全面的分类(Robins 2001: 237)。

描写语言学的上述人类学社会背景对该学派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多个层面。比如,正是这种社会背景使得美国描写语言学家特别重视语言调查的操作方法,即记录和分析语言的技术,并使得这一学派打上了深深的实用主义和操作主义的烙印。“美国的描写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具有自己的特点。第一是实用性。”(刘润清 1995: 164) Lyons(1970: 21)也认为,常常有人批评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者只重视发现程序(discovery procedure)^①,其实这种对操作程序的重视至少部分应归因于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的人类学社会背景,因为只有通过一套严密的分析手续,才能够对那些不为人们所了解的印第安土著语言作出精确的描写和分析。

1. 1. 1. 2 理论背景

1916年, Saussure 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出版,这标志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正式诞生,并由此引发了语言学上“哥白尼式的革命”(转引自 Robins 2001: 224)。Saussure 的结构主义语言观对以 Bloomfield 为代表的美国结构主义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一学派的思想源泉。

^① “发现程序”这一术语由 Chomsky(1957: 51)首先提出,用来指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通过切分和归类的方式对语言进行描写和分析的一套手续,也称“操作程序”(operational procedure)。在讨论语言理论的目标时,Chomsky 认为,可以试图让一套语言理论提供关于一部语法的“发现程序”(discovery procedure),这是最高的要求;或“决定程序”(decision procedure),这是低一点的要求;或“评价程序”(evaluation procedure),这是更低一点的要求。描写语言学家致力于发现程序的建立,然而他们是否真正达到了这一目标是很值得怀疑的(Chomsky 1957: 51-52)。

关于索绪尔和美国结构主义在理论上的渊源关系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国外学者较早以前对这一问题关注不多,不过 20 世纪 80 年代则有了一番热烈的讨论,如 Hymes & Fought(1981: 15)和 Harris(1987: xii-xiii)等认为,美国结构主义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一个学派,它和索绪尔语言思想并无多大联系, Hockett 甚至一度认为索绪尔对布龙菲尔德没有任何影响(不过他后来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见许国璋 1997a: 152);而 Newmeyer(1986: 3)、Joseph(1989: 55-63)、Koerner(1999: 210-217)等则认为两者关系密切。国内学者对此作过较为深入讨论的是桂灿昆(1963)和许国璋(1997b)。他们都基本认可索绪尔对布龙菲尔德的影响,以及后者对前者在理论上的某种继承和发展。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两种语言理论“相互间不存在继承关系”,它们属于“彼此独立发展起来的两种语言理论”(程曾厚 1999: 75)。造成以上分歧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大多数美国结构主义学者在其著述中很少讨论索绪尔理论,甚至也很少提及索绪尔的名字及其语言学术语;另一方面也在于两者的理论背景有很大的差异:索绪尔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语言,而以布龙菲尔德为代表的美国结构主义学者则是从行为主义和机械主义的立场来看待语言。不过,这并不能掩盖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后者对前者的继承、发展关系。对此可通过史料的考察对比与分析得以证明。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第一版问世于 1916 年。不过,由于 1914—1918 年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当时远在美国大陆的布龙菲尔德并未得到这个版本。直到 1922 年该书的第二版问世后,布龙菲尔德才得到该书。在此之前,他曾给美国人类学家 T. Michelson 写过一封信,信中写道:

你手头上有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吗?我还没见到过这本书,不过 Wackernagel 教授在一封信中提到过该书。我已经订购了一本,现在正急于得到它。 (Hall 1987: 41)

布龙菲尔德对该书的关注程度由此可见一斑。